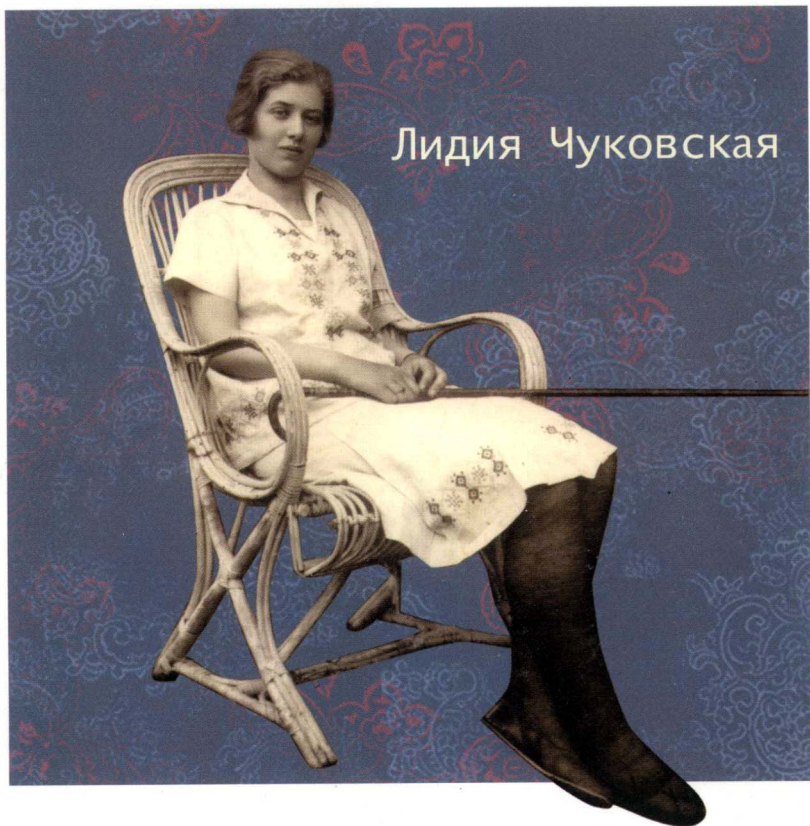


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



捍卫记忆

利季娅作品选

（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 著

蓝英年 徐振亚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捍卫记忆

利季娅作品选

（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 著

蓝英年 徐振亚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

Из Дневник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 Елена Чуковская, 2010

本作品中文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中心和俄罗斯 FTM 代理公司取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0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著;蓝英年 徐振亚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7-5495-0221-9

I. ①捍… II. ①利… ②蓝… ③徐… III. ①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1907~1996) — 日记 ②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1907~1996) — 回忆录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726 号

出品人:汤文辉

策划: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封面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30.5 字数:380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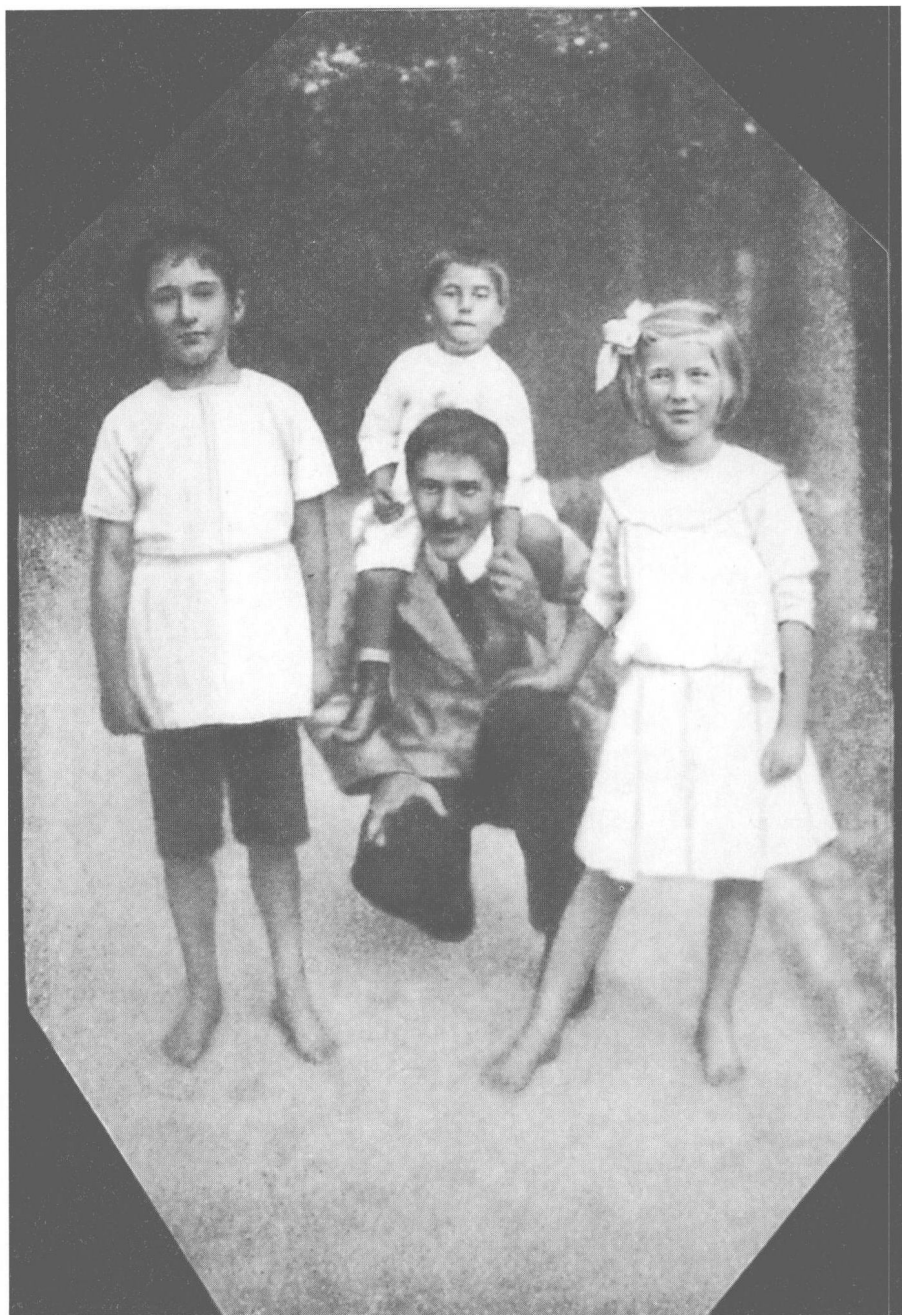
作者介绍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1907—1996）俄罗斯女作家、文学批评家。父亲、兄弟、女儿都是作家。父亲丘可夫斯基是苏联著名作家。丈夫在“大清洗”时期遇害。她写了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反映“大清洗”时期的恐怖。还用日记形式写了小说《下水》，描绘了正派作家在1949年受到的打击和迫害。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攻击两位被审判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她当即给肖洛霍夫写公开信，指出“刑事法庭无权审判文学，思想应用思想反驳，而不是用监狱和劳改营”。她积极声援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院士。1974年她被开除出作协，1988年恢复作协会员身份。

译者介绍

蓝英年 1933年生，江苏吴江市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1974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带硕士研究生，1993年离休。译著有《滨河街公寓》（合译）、《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合译）、《邪恶势力》（合译）和《塞纳河畔》；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苦味酒》、《回眸莫斯科》、《从苏联到俄罗斯》和《蓝英年随笔选》。

徐振亚 1943年生，上海嘉定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教学与研究，2006年获俄罗斯高尔基奖。译著有《另一种生活》、《罗亭》、《烟》、《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普拉东诺夫小说》、《马背日记》、《火灾》等；与冯增义教授合译《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老丘可夫斯基与孩子们



利季娅的少女时代



年轻时的利季娅



利季娅的标准像



我在1989年电视上初次见到的利季娅

记忆是无法铲除的(代译序)

—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简称利季娅)是苏联女作家,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可夫斯基的女儿,她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连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作家,在苏联并不多见。老丘可夫斯基十月革命前便已成名,交游甚广,同时代的文化名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同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交往。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为拯救知识分子不至于饿死,成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吸收他们参加,给他们一碗饭吃,并请丘可夫斯基主持出版社的工作。他也同被布尔什维克视为反动的作家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苔菲往来。他同画家列宾同住在芬兰湾小城库奥卡拉(今改名列宾诺),两人过从甚密。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宾专程到库奥卡拉看望他。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他的座上客,还为女儿利季娅画过素描。他是文学领域中的多面手,写童话故事、散文随笔、俄国作家和诗人的评论。他精通英语,翻译过莎士比亚的诗剧。可惜他不算无产阶级作家,处境一直不佳,他的重要作品都未译成中文,中国只翻译过《哎呀疼医生》和《洗呀洗干净》等几首儿童诗。他在中国远不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苏联正统作家知名。

中国读者更不熟悉利季娅了。我也是1989年才知道她的。那时我在苏联教汉语。一天晚上在俄国朋友家看电视,看见从美国回来的白银时代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另一位老太太,把放大镜贴在眼睛上看从台下递上来的字条。我问俄国朋友那位视力差的老太太是谁,他们惊讶地回答:“她是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您怎么连她都不知道?”我自惭形秽;在国内没听说过,就像1958年

苏联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我没听说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一样。自此我开始留意利季娅这个名字。1990年读了她的《被作协开除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1997年又读了她的《关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札记》。

叶连娜是利季娅的女儿，老丘可夫斯基的外孙女。叶连娜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1938年被镇压。她今年已年逾八十。为翻译这本书（《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我同她通过信，她给我发来27张照片。她说母亲最看重《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请我一定译出，并寄来阿尔汉格尔斯克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书中收集了作家们对小说的评论，比如1962年爱伦堡写道：“谢谢您寄来的小说，我一口气便读完了。小说深深打动了我。我首先敬佩您的勇气，1939年竟能写出并保存下来这样的作品，对所经历过的事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

二

1962年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批准，在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发表。毫不夸张地说，这篇写劳改营题材的小说震撼了苏联社会。利季娅同作家出版社签订出版《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的合同。“这是我最珍爱的中篇小说。”利季娅写道，“这是写三七年的小说，写于三九至四零年，是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队后随即写出的。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应由我评价，但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还有哪本写三七年（大清洗年代）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利季娅接着写道：“我想在小说中表现谎言对社会毒害到何等程度，可与之相比的只有军队使用的毒瓦斯。我选择的女主人公不是姊妹，不是妻子，不是恋人，不是朋友，而是象征忠贞的母亲。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在被肆意歪曲的现实中，人的所有感情都被扭曲，甚至母亲的感情。这便是我的构思。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寡妇，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儿子科利亚。科利亚被捕，判处十年劳改，并宣布他是‘人民敌人’。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已养成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的习惯，甚至胜过相信自己。检察官告诉她‘儿子供认罪行’，被判处‘十年外地劳改’，她相信检察官。可她心里坚信，儿子无罪，也不可能犯罪。儿子绝对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同志。但如果相

信自己,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那……就会天塌地陷,她内心的一点点慰藉将化为乌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想既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但这种想法导致她发疯……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没有能力概括所见到的和所感受到的。这不能责备她,因为对普通人的脑子来说,所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一切都被有计划地美化了,他们如何分辨美化过的荒谬?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具有同样感受的人一一隔开。像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样的人太多了,几百万,但生活在不允许人民阅读所有文件和文学的时代,几十年的真正历史被篡改的时代,他们只能根据个人经历独自思考,思考能力自然会降低……多年来我只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写在中学生厚笔记本上。我不能藏在家里,三次搜查和没收全部财产的经历记忆犹新。朋友替我收藏笔记本。如果从他家里搜出笔记本,他会被五马分尸。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做手术,我的朋友留在列宁格勒。他因健康原因未被征召入伍,围困期间活活饿死,我知道他死的时候已经在塔什干了。临死前他把我的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个都活着,把笔记本还给她。’”

中国同样没有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作品。谁在“这里和那时”写过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吓破胆。整人的自然不会写,竭力表现自己的忠诚,争取火线入党。挨整的不敢写,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如何。有些老实人真诚地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拼命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不敢也不会思考所发生的事。起哄者但求自保。即便清醒的人认识到运动的荒谬,也不会产生秉笔直书的念头。恐惧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怎能不佩服利季娅的胆识呢?

三

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印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1962年9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通过,并与利季娅签订合同,1963年1月预付60%稿酬,3月排出清样,配好插图,马上开印。社长列修切夫斯基及其第一助手(总编辑)卡尔波娃一致肯定小说的价值。他们的态度可以理解。“怎能不这样!‘个人崇拜’被揭发,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每家报纸、每家杂志、每家出版社多少都要响应‘揭发大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啊。文章啦,诗歌啦,中短篇小说以至

长篇小说啦。响应了！卡尔波娃深深地叹息，痛心地谈到艰难的去，多亏党英明而及时地予以揭发，过去一去不复返了。接着又谈到‘恢复党内生活中列宁主义的准则’。”利季娅记述了同总编辑的谈话。

“忽然——有的人先感觉到了，我则晚一些，”利季娅写道，“准确地说，在六三年才有感觉——令人不安的传言四起，并越传越离奇：‘上面’改变路线了，对文学深入揭露‘个人崇拜的后果’不满，还要多谈成绩，不要只谈‘错误’。党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所作出的决议已经说明了一切，并改正了一切，够了。幸存的人从劳改营和监狱中放回，恢复了名誉，不仅给他们提供住房，还给他们安排工作。能想得到吗？给牺牲者的亲属颁发他们的儿子、姊妹、丈夫死后平反通知书。还要怎么样？何必往伤口上撒盐呢？按时开展播种运动或收获运动吧。‘让工厂新的炼钢炉都升炉吧。’”

5月利季娅被邀请到出版社，出面同她谈话的是编辑部主任，斩钉截铁地通知她，小说不能出版，却没说清不能出版的原因。利季娅找总编辑卡尔波娃解释。这位十分赞赏小说的总编辑此刻判若两人，态度完全变了，毫不迟疑地对利季娅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您的小说在思想上是有害的。个人崇拜的原因及后果报纸上刊登的党的文件中讲得清清楚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几次发言以及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见知识分子的谈话讲得更清楚了。我对您的有害立场从未怀疑过。”她从未说过小说思想上有害的话，相反，比别人更急于同利季娅签合同。总编辑的厚颜无耻倒让利季娅不知所措了。说句公道话，并非卡尔波娃天生爱撒谎，上面的政策变了，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她必须跟着改变。称赞利季娅的小说是一个时期，认定她作品有害是另一个时期。她不得不执行上面的指示，又无法向作家说明改变观点的原因（有党的纪律），只好经常说谎了。

利季娅向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法院投诉作家出版社毁约。1965年4月24日法庭开庭。出版社律师发言，“出版社的编辑们先前处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局势的狂热中’，未能发现这些差错，现在通过学习党的新决议，‘用另一种眼光看小说’。”他坦率说，“我们自己未能发现劳改营题材的危害，而是领导向我们指出：共产党员没有必要出这类题材的书，主要是没有益处……”利季娅的律师则强调合同的严肃性，毁约一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审判员请利季娅答辩。利季娅说：“如果不再出版劳改营题材的书，特别是索尔仁尼琴的书，对国家是件不幸的事。至于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他的《伊万·杰尼索维

奇》，写于不同年代，写的是不同的时代，题材并不相同。他写的是劳改营，我写的是‘自由人’……即便我的小说是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局势的狂热中’通过的，现在是否又在新局势的狂热中毁约呢？难道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仅仅是‘局势的狂热’？……过去年代的暴行所以能够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因为报社编辑部堆满了哭诉的信——亲人们在信中乞求援助，要求重新审查他们亲人的案件——可报刊被剥夺了发表这些信的权利？编辑不敢不迎合局势。确实，在那种年代‘谁敢吭气’？签订类似哀号的作品的合同无异于判处自己死刑。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的所有编辑部都时刻听从召唤。所有报纸、出版社和杂志的编辑部永远服从站在乐谱架旁边指挥的指挥棒。登不登这样或那样的报道（如非法逮捕和拷问），都要听从指挥，是否也是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呢？……就算我的小说仅仅是照片，而不是画卷，但这张照片摄取了我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画面，小说对于思考我国所发生的灾难的人是必不可少的。”

利季娅胜诉，出版社支付了她全部稿酬。

四

为了不忘却悲惨的过去，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为无辜牺牲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利季娅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局并不希望人民记住过去。1965年开始了遗忘个人崇拜的后果并竭力颂扬这一时期成绩的过程。

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于是，“先存在一半，”利季娅写道，“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多亏我们报刊只有一张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

请看1965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1965年作家斯拉文出版了一本《肖像与札记》，其中谈到苏联驻法西斯意大利的著名记者维克托·金：“在那些年代，金说过，他幻想活到起义的人们把墨索里尼送上绞刑架的那一天。金的预言实现了。但……他本人没能活到凯旋的那一天。他无法预见本人发生的耸人听闻的事。”他发生了什么事？也像墨索里尼那样被送上绞刑架？还是患了癌症？作者没说出发生了什么事：金

1937 年被斯大林处决。

70 年代到了几乎全面禁止提及过去的时代。不是完全不提人们殁死狱中，便是把犯人的生活变成旅游者的生活。

举一个避免写“惨死”的高超例子。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州委第一书记卡尔梅科夫 1938 年被处决。后来恢复名誉——获得被处决者罕见的殊荣——在州首府纳尔奇克市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我们看看奇马廖夫和科米萨罗夫两位作者在《主要是向前看！》中是如何报道的：

“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在纳尔奇克市街道上玩耍，对他们来说他的名字就是历史。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们经常来到广场上的纪念碑前，望着别塔尔·卡尔梅科夫的铜像时而落泪。”

其实作者们应当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们落泪的原因，但他们在书中只字未提。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作家迪姆希茨笔下变成旅行家。革命前到过西欧，意大利和巴黎，回国便在国内漫游。在克里木住过，在莫斯科住过，在彼得格勒住过，后来又去克里木，后来到第比利斯，后来又回到彼得格勒，后来又回到莫斯科，又到第比利斯，后来是埃里温，是罗斯托夫，是彼尔姆，是阿布哈兹，再后来呢，来到卡马河上的小城切尔迪尼，后来是沃罗涅日——再后来呢——旅行之路中断了。可切尔迪尼和沃罗涅日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流放地，曼德尔施塔姆被押来押去，最后死在海参崴近郊的劳改营转运站。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那首嘲讽斯大林的诗《我们活着，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劳改犯变成旅行家。

五

利季娅决心捍卫记忆，与谎言斗争。不再允许别人铲除对被迫害人的真实回忆，宁肯不发表，宁肯得罪人，也决不妥协。不少出版社和报刊向她关上大门。

“不久前我还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苏联作家。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利季娅写道，“但对每个人来说，真理总有一天会扼住你的脖子，永远控制你的灵魂。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扼住所有人的脖子。‘灵魂是密林，道路难分清。’我的故乡审讯室里流淌鲜血的时候，真理扼

住我的脖子。我睁开眼睛是不是迟了?当然,我没在农业集体化年代醒悟,然而终于醒悟了。睁开眼睛后,虽然不准备发表,准确地说,隐藏在地下,但我仍然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记录了丧失理性的社会。过了二十年(斯大林死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召开后),我与很多人一样被希望所迷惑。这么说我没白写,现在可以发表了!人们将会阅读我的小说。但我的希望落空了。那时我明白了,我们这里又开始剥夺记忆了,我还明白了其他的事:无论如何我不会交出用痛苦换来的财富,并竭尽全力阻挠人民再次失去记忆。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决不考虑、掂量、权衡哪样做好,多少谈论一下牺牲者还是什么也不说,因为不让说嘛。就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铲除记忆的办法之一是用谎言代替真理,美化、粉饰现实又是说谎最简便的方法。遗憾的是,不少人采取了这种方式,所以他们在作家协会占据显要的地位。像利季娅这样解决问题的人陷于被整肃的处境。

利季娅认为,对待斯大林时代大致有三种态度。“‘我们发生过的,确实发生过。’一些人说,自嘲热爱真理的人。”利季娅写道,“他们确定自己公正的看法后,便画上一个热爱真理的肥大句号。瞧,我们多公正!承认‘确实发生过!’‘我们发生过的一切根本没发生过。’另一些人说,‘当然,斯大林做过一些错事——过火,错误,但这一切党已经通通揭发了。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建设共产主义!人死了不能复活,越少谈论过去越好。’‘必须追查所发生的一切,’第三种人说,其中也包括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的,竟导致如此惨重的后果。泪水冲洗不净的伤口已经溃烂。忘却所发生过的就无法前进一步。’”

1968年2月利季娅写了一篇文章《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要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追查这架把充满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冷冰冰的尸体的机器。要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宣读判决书,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不能把这笔账一笔勾销,盖上‘清账’的戳子了事,而要拆清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一圈一圈地拆……几百万农民家庭,劳动者,在‘富农和富农帮手’的罪名下,被赶往北方,赶往死地。几百万城市居民在‘间谍’、‘破坏者’和‘危险分子’的罪名下被关进监狱和劳改营,有时直接送往另

一个世界。整个民族被指控叛国，从他们的祖居地赶往异邦。

“什么导致我们陷入亘古未有的灾难？手无寸铁的人民对扑向他们的机器如何抗拒？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国家保安部门（每时每刻、白天黑夜都在犯法）与维护法律的检察机关（多年有意熟视无睹）化合为一体，最后，又与以捍卫正义为天职的报纸化合为一体，报纸为何不捍卫正义，反而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千遍一律地诽谤受迫害者——被揭发出来的、死不悔改的、卑鄙无耻的、出卖给外国情报部门的人民敌人？

“这种化合是学者们所知道的化学化合物中最可怕的化合，它起于何时又如何化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化合成功？研究其中的原因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浩瀚的工程。而首先是对作家。这是今天头等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急迫的工作。应当号召人们，年长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只有那时未来的道路才能变得清晰。如果这项工作及时进行，那就不会有不久前的文字狱了。”

六

利季娅实现自己的誓言，她写的文章一定保留牺牲者的名字，并说出死亡的原因。“他们建议我删除某页、某半页、某段或某句，在我删除某句或某段后，作品将发排、出版，也许还受到赞扬。但一提到删除牺牲者的名字我便断然拒绝。”1966年，在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前，仍有报刊和出版社约请她写文章。由于父亲的关系，她几乎认识所有老一代的文化人。比如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马尔夏克是利季娅父亲的朋友，又同她一起工作了九年。1964年7月马尔夏克去世，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马尔夏克纪念集，也请利季娅写回忆文章。利季娅写好后编辑很满意，通知她回忆录已经发排了。但第二天，总编辑卡尔波娃的助手索洛维约夫要求删去半页，一共两段。第一段：“1937至39年，马尔夏克的某些同事被捕并消失——有人长期消失，有人永远消失，他站出来为无辜受迫害的人说话，并起了作用。”第二段：“……岁月流逝。斯大林死后人们开始返回并获得新生。1955年尤里·格尔曼在《文学报》上为30年代马尔夏克所领导的‘列宁格勒编辑部’说了几句公道话。‘仿佛打开封堵的门’，马尔夏克读完这篇文章对我说……”出版社的要求遭到利季娅的断然拒绝，她的回忆录

被从纪念集中删除。

1966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约利季娅为作家米尔奇科30年代写的童年小说写序,30年代利季娅曾是这篇小说的责编。米尔奇科的儿子也找过利季娅,请求她不要推托。儿子请求为他牺牲的父亲写前言,利季娅又怎能拒绝呢。利季娅写了,主要写米尔奇科的童年,他如何在机械作坊举轮子,他与马尔夏克的结识,但也写了他被捕,死在狱中。编辑部对她的序很满意,小说连同利季娅的序马上发排。4月末的一天,将近午夜12点,利季娅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分社社长请利季娅接电话。社长说他很喜欢她的序言,非常喜欢,但要求删去一段话。

“哪一段?”

“您知道我们是为儿童出书的出版社,不应用过去悲惨的回忆在他们生活中投下阴影。”

投下阴影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1938年2月米尔奇科被捕。马尔夏克所创建的编辑部全体职工被驱散: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

利季娅对社长说,米尔奇科的书是为青少年而不是为婴儿出版的,及时让他们知道父辈和祖辈的经历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做不到。”社长回答。利季娅请求把序言寄回。

不久利季娅收到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信中有道:“您不肯从您为米尔奇科小说《斯乔普卡的童年》写的前言中删除一个段落和另一段落中的一句话,作为编辑我深表遗憾。我知道您的想法,但请您为读者着想。您拒绝发表前言,使读者失去阅读小说连同与小说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您卓越的文章的乐趣。利季娅·科尔涅耶夫娜,请您再次考虑一下小说和读者。”这封信含蓄地批评利季娅过于任性,几行字都不肯删去,激怒了利季娅。利季娅回信道:“我与您(出版社)争论的不是‘一段话或一个句子’,而是人的鲜血和人的话语权。你们准备出版的书的作者米尔奇科是卓越的作家,我的挚友,党员,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老工人,参加过两次革命的活动家,在斯大林兽行肆虐时期,同千百万无辜牺牲者一样,被野蛮杀害……您提到应为新的一代人,为新的读者着想,可他们需要的是真相,不仅是上世纪90年代的真相,即米尔奇科在小说中所写的时代,还需要告诉他们本世纪几十年的真相,在这几十年里,正是现在的青少年的父辈和祖辈牺牲的年代。”利季娅不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尔奇科的儿